

“走近中国”文化译丛

钱林森主编

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曼德维尔游记

[英] 约翰·曼德维尔
John Mandeville 著

郭泽民 葛桂录 译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曼德维尔游记

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英) 约翰·曼德维尔

John Mandeville 著

郭泽民 葛桂录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曼德维尔游记 / (英)曼德维尔 (Mandeville, J.) 著; 郭泽民, 葛桂录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9

(“走近中国”文化译丛 / 钱林森主编)

ISBN 7-80678-601-5

I. 曼... II. ①曼... ②郭... ③葛... III. 游记—作品集—英国—中世纪 IV. I56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0007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上海书店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本书中译本译自 John Mandeville, *The Travels of Sir Mandeville* ©Norman Denny and Josephine Filmer - Sankey, 1973)

“走近中国”文化译丛

曼德维尔游记

约翰·曼德维尔 著

郭泽民 葛桂录 译

责任编辑 欧阳亮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丁多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168 1/32
印张 5.25
字数 85 千字
版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
ISBN 7-80678-601-5 / I·75
定价 16.00 元

总 序

自古以来,人类任何形式的出游、远游,都是基于认知和发现的需要,出于交流和变革的欲望,都是为了追寻更美好的生活。诚如史家所言,“哲学精神多半形成于旅游家经验的思考之中”,^①中西文明的发展与相互认知,亦可以说,始于彼此间的造访、出游。事实上,自人类一出现在地球上,这种察访、出游就开始了,可谓云游四方。“游”,是与人类自身文明的生长同步进行的。“游”,或漫游、或察访、或远征,不仅可使游者颐养性情、磨砺心志,增添美德和才气,而且能使游者获取新知,是认识自我和他者,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方式。最初的西方游历家、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使节,则构筑了中西文明往来交流的桥梁,不论他们因着何种机缘、出于何种目的来到中国,都无一例外地在探索新知、寻求交流的欲望下,或者在一种好奇心、想象力的驱动下,写出了种种不同的“游历中国”的记游(包括日记、通讯、报告、回忆等)之类的作品,从

^① 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上),第197页,许钧、钱林森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而构成了中西方相知相识的历史见证,成为西方人认识自我和他者、认识中国、走近中国的历史文献,在中西交流史上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尤其在今天回归民族复兴之际,重读、译介这些历史文本,本身就是研究“西学”和“中学”不可忽略的一环,是深入探讨中西方文化关系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创立《走近中国》文化译丛的动因正在于此。

了解西方人认知中国的过去,才会理解直至今日西方人为什么对中国人依旧充满偏见和误解。在中西两大文明进行实质性的接触之初,西方人——西方旅游家、作家、思想家和传教士,总习惯于将中国视为“天外的版舆”,将这个遥远、陌生而神秘的“天国”看作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异类世界”,他们在其创作的中国游记,以及有关中国题材的其他著作中,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与想象塑造自己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一个迥异于西方文化的永远的“他者”形象。在西方不同时代、数量可观的中国游记中所创造的这种知识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相交织的“中国形象”,无疑是中西交流史上一面巨大的镜子,从中显现出的不仅是“中国形象”创造者自身的欲望、理想和西方精神的象征、文化积淀,也是西方视野下色泽斑斓、内涵复杂、想象误解的“中国面影”。这就决定了,西方的中国游记和相关题材的著作,既是中国学者研究“西学”的重要历史文献,又是西方人研究“中学”的历史文本,其历史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西方早期的中国游记,多半热衷于异乡奇闻趣事的报导而缺乏哲学的思考,但它们所提供的中国信息、中国知识和中国想象,却为西方哲人、特别是16世纪以降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思想家提升自己的哲思,提供了绝好的东方思想资源,并且成为他们描述中国、思考中国不可或缺的参照。特

别是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游记和著述,所展示的中国形象、中国知识,直接构成了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主要的煽情材料和思想资源,直接助成了19世纪西方汉学生长和自觉发展的重要契机。如是说,文化译丛《走近中国》的创意,正基于此。

西方的中国游记浩如烟海,受制于个人精力、能力和出版诸因素,译丛编选者只取一瓢饮。其标准有二:一是该文本的影响力,即这些文本至今影响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是西方人眼里的经典;二是该文本的文学、历史价值,即这些文本不仅有较强的可读性,且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译丛精选的作品是:曼德维尔的《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约1357年)、格莱特的《达官冯皇的奇遇——中国故事集》(*Les Aventures merveilleuses du Mandarin Fum-Hoam, contes chinois*, 1723)、奥古斯特·波尔热的《中国和中国入》(*La Chine et les Chinois*, 1842)及相关研究文献^①、绿蒂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g*, 1901)、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中国书简》(*Lettres de Chine*, 1967)、亨利·科尔迪埃的《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La Chine en France au XVIIIe Siecle*, 1908)、毛姆的《在中国画屏上》(*On a Chinese Screen*, 1922)、奥登和衣修伍德的《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 1939)、亚历山塔丽雅-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éel, 1868—1969)的《巴黎女子拉萨漫记》(*Voyage d'une Parisienne à Lhassa*, 1927),以及《开放的中华》^②(*La Chine ouverte, Aventures*

① 中译本名为《奥古斯特·波尔热的广州散记》。

② 该书中译本由山东画报出版社于2005年4月出版。

d'un Fan-Kouei dans le pays de Tsin, par OLDE Ni CK?), 共十部,且每一种译文前撰写专文解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十部著作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西相知交流的历史缩影。

《走近中国》文化译丛行将刊行面世时,首先得感谢倪为国先生、杨全强先生,是他们给予译丛刊行面世的机遇,并为此付出了辛劳;感谢译丛所有译者,他们的辛勤劳作和协作精神,得以使本丛书顺利地整体推出;感谢巴黎国家图书馆东部部主任裴程先生、法兰西学院东方图书馆、巴黎国家美术博物馆一些不知姓名的法国朋友们,感谢巴黎楼梯书店(Librairie de l'Escalier)妲妮爱尔·娜海(Daniele Naret)夫人、巴黎索邦大学游记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穆勒教授(François Moureau)以及金丝燕博士、张弛博士和叶向阳博士,是他们热情的建议、帮助和提供的诸多方便,使我得以在前年巴黎访学期间补充相关珍贵资料,为本译丛增添新的内容和色彩。最后,还应当感谢原山东画报出版社年轻的朋友曹凌志先生,是他2002年10月挟《开放的中华》原版书到敝人寓所来访,助成本译丛的构想、创设,并在社长刘传喜先生支持下付之实施,拟议中的译丛规划,后来虽因曹先生北上高就而半途夭折,但他对学术开发的热情和努力,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光如流水,悠然间,又流去了六个春与秋,原先构想的译丛计划,几经出版的折腾,加之主持人年迈和精力的限制,已无意也无法加以实施,仅以本辑译丛敬献于读者,并告慰于一切关注过、支持过译丛的海内外朋友们,是为序。

钱林森,2006年6月20日,南京大学

中译本序

我们在此向读者译介的是欧洲中世纪一部极富想象力的散文体虚构游记《曼德维尔游记》(以下简称《游记》)。几个世纪以来,对该《游记》价值的评判颇多差异。它曾被15世纪的航海家哥伦布引为环球旅行的证据,其作者既被17世纪著名的游记探险作品的编纂者塞缪尔·珀切斯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亚洲旅行家”,又被18世纪的文坛领袖约翰逊博士誉为“英国散文之父”;该书在19世纪也曾被讥讽为剽窃之作,20世纪中后期,又重新被定位为“幻想文学”的代表作。

现在看来,《游记》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是毫无疑义的。作为游记文学,它展现给基督徒们许多陌生世界的生动图画;作为地理资料,它使欧洲的探险者坚信环球旅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与《马可·波罗行纪》一起,首次真正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中国持久而浓厚的兴趣。可以说,在地理大发现之前,马可·波罗写实的游记与曼德维尔虚构的游记,就是欧洲人拥有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但人们却拒绝相信马可·波罗的

描述,朋友们在他临终时请求收回他传播的所谓谎言,以拯救他的灵魂。人们把他当作取笑对象,吹牛者的代名词,却丝毫不怀疑曼德维尔那本虚拟游记的真实性,真可谓假作真时真亦假。确实,曼德维尔把关于东方的诱人镜像吹嘘得眼花缭乱:那世间珍奇无所不有的蛮子国,那世界上最强大的大汗君王,以及他那布满黄金珍宝、香飘四溢的雄伟宫殿,还有那遥远东方的基督国王约翰……在这般神奇斑斓的幻景里,历史与传奇难以分辨,想象与欲望紧密相连,共同构造出人们心目中的乌托邦世界。

时至今日,这本《游记》仍然活力未衰,不仅能供专家学者研究参考,而且也满足了各类读者的欣赏需求。不过,盛名之下,人们对它已是疑窦丛生:作者究竟是谁?他旅行过哪些地方?它性质驳杂,到底是游记、地理书还是历史书?最初以何种语言问世?即便这一连串问题都陆续得以揭晓,它仍旧云遮雾掩般,令人好奇之心欲罢不能。

《游记》作者的生平境遇在该书的不同文本中歧说纷纭,且多有矛盾之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在英文本的编注者《序言》中基本可了解其来龙去脉。当代研究者们对此的争论集中于他是“生活在英国的英国人”,还是“生活在法国的法国人”?两位研究欧洲中世纪游记的著名学者贝内特(J. W. Bennett)与西摩(M. C. Seymour)各执一词。贝内特认为游记作者是生活在英国的英国人。他说“证明该书源于英国的最明显证据是该书的诺曼法语(Norman-French)风格,那时期的法国人一致认为这种法语是粗俗的、野蛮的。该书的韵

律和字序更具英国特色而不是法国特色”。^① 对于究竟谁是作者,贝内特提出了三种可能性,(1)确实有一位曼德维尔先生,他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旅行家,他写作了此书;(2)确实有一位名叫曼德维尔的旅行家,一位游记文学的学者以他为原型创作作品;(3)一位游记文学的学者凭空创造了曼德维尔这一形象和游记。^② 西摩反驳了贝内特的观点。他总结出来了该书匿名作者的五个特征,勾画出了作者的形象:(1)他是一位法国人,于1357年在一家大型的富藏同时代资料的图书馆里收集写作资料,这个图书馆很可能是位于法国北部或佛兰德斯的教会图书馆;(2)他是一位教会人员,对圣经知识非常了解;(3)他能够熟练地阅读拉丁文,但是缺少有关阿拉伯文和希腊文的知识;(4)他有渠道获得描写圣地和异国情调的书,相信环球旅行的可行性;(5)他从未去过他所描写的地方。据此,西摩认为真正的作者应是一个“生活在法国的法国人”。^③

学者们的研究争论让我们渐辨渐明。一般认为,《游记》中的曼德维尔是英国散文始祖约翰(John the Beard)的托名。约翰本人是博洽多闻的学者、医生、语言学家及虔诚的基督徒,他对周遭的世界和人类事务怀有强烈的兴趣。从某些方面看,他是阔步于时代前面的人。当时基督教相信地球是平的,他则坚信是圆的。他想象力强健丰富,天性卓荦不凡,所

① Bennett, Josephine Waters. *The Rediscovery of Sir John Mandeville*. New York: MLA, 1954. p. 179.

② Bennett, Josephine Waters. *The Rediscovery of Sir John Mandeville*. New York: MLA, 1954. p. 182.

③ Seymour, M. C. *Sir John Mandeville. Authors of the Middle Ages 1; English Writers of the Late Middle Ages*. Brookfield, VT: Variorum, 1993. p. 23.

著《游记》相传为英国世俗文学中最初的散文著作,因为“它首次或几乎是首次尝试将世俗的题材带入英语散文的领域”。^①该书写成后辗转传抄,译本众多,有识之士莫不人手一编,其风靡程度丝毫不让《马可·波罗行纪》。虽然此书中所述关于蒙古和契丹的知识,基本上从鄂多立克的游记脱胎出来,但欧洲文学里的中国赞歌实由此发轫。

尽管约翰·曼德维尔爵士被珀切斯誉为继马可·波罗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亚洲旅行家”,但他充其量是个乘上想象的翅膀、身在座椅上的旅行家。游记自然为面壁之作,人们对此也不是没有逐步察觉,关键是读者已经不在真伪问题上多费周折,倒宁愿不明究里地跟着作者到那些奇异的国度里遨游一番。个中原委,似大可探究。

关于该书的最初写作语言,学者们普遍认可为法语。因为在作者生活的那个时期,法语被广泛使用于英国受教育阶层中。起初,由于科顿(Cotton)英文版本里的一段话,人们通常认为曼德维尔使用拉丁语、英语、法语三种语言进行了写作。直到19世纪80年代,尼科尔森(E. W. B. Nicholson)证明了该书最初用法文写作,而拉丁文和英文的版本系由佚名人士翻译而成。^②之所以选用法语进行创作,是因为在英国,法语比拉丁语更易懂。为什么出现英语译本,则是由于14世纪下半叶以来法语在英国的统治地位日渐衰弱,英语开始被用于世俗题材的写作。

① Letts, Malcolm. "Introduction." In *Mandeville's Travels: Texts and Translations*.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53. 2 vols. 1: xlv.

② Letts, Malcolm. *Sir John Mandeville: The Man and his Book*. London: Batchworth, 1949. p. 22.

关于该书的写作时间,各抄本说法不一。1371年,作为最早版本的巴黎版《游记》中说,曼德维尔出发时间是1322年,返回时间是1357年。科顿版本中出发时间也是1322年,返回时间则为1356年。而在埃杰顿(Egerton)版本中,出发及返回时间都推迟了10年,分别为1332、1366年。因此,根据三种主要版本的手稿,曼德维尔创作的时间可能是1357、1356、1366年。学者们经过反复考辨,希望能够窥其创作的准确时间,目前普遍得到认可的是在1357年。不过问题依然存在,既然书中的很多情节都是虚构的,我们又如何能相信这个归来的时间,并据此推断创作时间呢?还有一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兴趣。鄂多立克的旅行时间是1317—1330年。如果1322年是曼德维尔出行时间的话,那他是在鄂多立克回来前离开的。曼德维尔是否想以此掩盖他援引别人资料的事实。埃杰顿版本中,出发时间改为1332年,或许是译者发现了作者的抄袭行为,以行程的变化暗示作者的剽窃举动呢?①

关于《游记》的所属文类问题,长久以来,学术界颇多争议。大家普遍认为该书难以归属传统文类,但对其准确定位又众说纷纭。贝内特坚持认为它属于“美文学”(belles lettres)之列,“从该书中我们不但能够获取知识信息,而且能获得愉悦之情。该书不仅可与描写东方的著述放在一起,而且可与那些充满想象的作品、旅行浪漫故事及社会批评类的作品等量齐观。换句话说,从一开始,该书就在美文学之列”。②

① Koss, Nicholas. *The Best and Fairest Land: Images of China in Medieval Europe*. Taipei: Bookman Books, Ltd, 1999. p. 153.

② Bennett, Josephine Waters. *The Rediscovery of Sir John Mandeville*. New York: MLA, 1954. p. 84.

莱茨认为该书属于欧洲基督徒亚洲纪行。^①当然还有不少学者认为该书属于有特殊风格的游记文学或属于混合型文类。

19 世纪下半叶,人们逐步认识到该书并非一次真实游历的记录。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考辨,曼德维尔所讲故事的资料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东方行纪》,博韦的文森特(Vincent of Beauvais)的《世界镜鉴》,柏朗嘉宾(John de Plano Carpini)的《蒙古行纪》,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的《东游记》,海敦亲王(Haiton the younger)的《东方史鉴》,以及流传甚广而实系他人伪造的祭司王约翰的信(The Letter of Prester John)。其中像文森特那部大百科全书性质的《世界镜鉴》,就是他主要的常备物,该书收录了古代和中世纪许多有关地理学及自然史的学说。而柏朗嘉宾,尤其是鄂多立克的东方游记更是他的重要参考读物。相比较而言,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并未被大量援引,或许马可·波罗的游记在此之前已得到了广泛传播,为避嫌,它不在该书作者的引用之列。

对于使用以上资料的评价问题,19 世纪后期的人们觉得它应该属于剽窃范畴,最多只不过加入了作者自己的一些构思和改写。比如,对《游记》资料来源颇有研究的学者博韦斯肯(A. Bovenschen)和沃纳(G. F. Warner)就将《游记》定为抄袭之作,甚至连作者的身份、国籍也受到了质疑。

直到 20 世纪中后期,人们的评价标准有所变化,重新认定该书为幻想文学(Imaginative Literature)的代表作。最先

① Letts, Malcolm. *Sir John Mandeville: The Man and his Book*. London: Batchworth, 1949. p. 141.

持此观点的贝内特认为,《游记》不仅属于人们对未知世界探险的历史,更属于文学世界。正是在与英国文学经典的比较中,该书的质量和影响才得以充分的体现。^①于是,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同乔叟、莎士比亚等伟大作家的作品一样,《游记》的价值不在于它使用了什么样的资料,而在于作者是如何选择并运用这些资料的。作者运用娴熟的艺术技巧,用一条迷人的叙事线索,汇聚那些千头万绪的资料,富有魅力,令人称奇。确实,我们阅读这部游记时感受到,曼德维尔有一种让其他书里并非那么神乎其神的记述,达到戏剧化效果的本领。如鄂多立克告诉人们,大汗宫廷的变戏法者如何让金杯盛满酒在空气中飞行,并使之自行到达赴宴者嘴边时,曼德维尔认为这尚不足以激动人心,转而引入了能够把白昼变成黑夜、把黑夜变成白昼的巫师,他们还能创造出娇媚可人的少女翩翩起舞、英武豪侠的骑士厮杀比武。

曼德维尔爵士至少通晓四种语言,在汲取各方材料时常常旁绍远求、左右逢源。加之平时留意收集那些道听途说的信息,各种传闻以及旅行者的故事等,以备征选。更由于他有移花接木、添油加醋的本领,种种信息一经他重新组合,便变得头头是道、活灵活现,仿佛是他耳听目遇、亲身经历一样。所以,这本书更像是各种历史、地理、旅行等知识的大杂烩,佐料当然是他自己个人的想象力,并以假乱真地添加一些意在让读者相信他确实到过那里的次要细节。如《游记》里说他和同伴们及大汗军队共同作战有15个月之久,进攻蛮子王国,

① Bennett, Josephine Waters. *The Rediscovery of Sir John Mandeville*. New York: MLA, 1954. p. 259.

目的是想见识一下大汗富丽堂皇的宫殿。“我们想知道这一切是否像我们所听说的那样。事实上,我们发现它比传说中的更完美、更富有、更令人惊叹不已。如果不是我们亲眼听见,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虽然也许有人不相信我们,但我不得不告诉你,在我已经见识过那一切之后,不管有没有人愿意相信我,这一切都不会改变。”(中译本第六章“契丹王国”之“大汗”部分)作者还自称该书是前往圣地朝圣的最好的导游书,其中的记述都以其本人亲身体验为基础,手稿曾经教皇本人审阅,教皇也宣布说“其中所载的一切内容都正确无疑”。这种自称也有点以偏概全、以假乱真的宣传效果。

曼德维尔关于中国部分的叙述,尽管材料主要来源于鄂多立克,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风格完全不同。两部作品中,叙述者曼德维尔的仁慈、宽容与鄂多立克的刻板、正统形成了鲜明对照。一个充满热情和活力,另一个蹒跚而行;一个进行着奇异的精神漫游,另一个进行着艰难的肉体跋涉。鄂多立克组织作品材料似无选择,凡是他经历的以及能够回忆起来的都记录无遗;而曼德维尔则进行了文学的筛选和创造。两者在形式、物质和意图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①与鄂多立克显示的排外心态相比,曼德维尔更具包容性。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游记主人公形象——曼德维尔,他诚实、谦恭、敬畏上帝;他眼界宽阔,幽默风趣并富有探索精神;他坦率、自省,引发读者的深思及自我审视:欧洲是否具有对真理、知识、宗教等的垄断权?

① Bennett, Josephine Waters. *The Rediscovery of Sir John Mandeville*. New York: MLA, 1954. p. 39.

研究中世纪欧洲中国形象的著名学者科斯(Nicholas Koss)认为,中世纪欧洲人关于中国形象的建构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通过亲身游历构建中国形象,如鄂多立克;二是通过改写原有的欧洲文本建构中国形象,如曼德维尔;三是通过亚洲或中国人的叙述话语构建中国形象,如马可·波罗。^①相比较而言,曼德维尔笔下的中国形象与鄂多立克眼中的中国形象就有较大的差别,两者的侧重点不同。鄂多立克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侧重表现物质层面,如城市的宏大、人口的众多以及食物的充足。他在其作品中提到10个城市,均有整段描写。曼德维尔作品中仅列出了6个城市的名字,其中只有3个城市有较详细描写,而且描述的城市规模均比鄂多立克作品中的小很多。曼德维尔在鄂多立克文本的基础上做了不少改进,发挥了不少想象。其中特别注重于中国人的方方面面,如对中国男人的胡须、中国女人的裹脚、中国人的宗教活动、侏儒及中国富人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游记》的几个主要版本在中国形象的重塑方面并非如出一辙。在法文本《游记》中,曼德维尔刻意拉开了读者与中国的距离,这与鄂多立克的做法有别。鄂多立克的作品往往使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还不断拿中国与欧洲比较,例如城市的大小、人口的众多、女人的美丽等,读者犹如伴随鄂多立克共同游历中国。曼德维尔的做法完全不同,他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方式,拉开了读者与中国的距离,同时较少将中国与欧洲作对比,只是说中国的女人是那个地区更加美丽的,中国

① Koss, Nicholas. *The Best and Fairest Land: Images of China in Medieval Europe*. Taipei: Bookman Books, Ltd, 1999. p. 136.

的乳酪在那个地区更大、更便宜。曼德维尔显然拒绝接受鄂多立克试图传达给读者的信息——中国在许多地方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仍然想象西方的社会、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科顿英文版本的作者经常通过增加一些单词和短语，使得关于中国的描述更加确切。比如，曼德维尔描写中国是“best land and one the fairest”，科顿版本的作者增加了“in all the world”。关于侏儒的活动，该版本中不仅说他们在生产棉和丝，而且说他们在生产金和银。类似的例子很多。科顿版本在原有文本的基础上加入了他对中国的想象，强化了中国的魅力。关于富人生活的描写，在鄂多立克和法文版《游记》中都描写了其奢华与富有，只是程度略有不同。而在科顿版本中还写到了富人们的私生活，负责伺候富人的少女们要陪寝。这可能是出于翻译过程中的误读，法语“coher”有陪同打猎的意思，这里被理解成为陪寝。与法文版一样，科顿版本的作者也一样厌恶富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女人裹脚的行为。

另外，科顿版本的作者很可能是一位僧侣，因为他非常关注宗教方面的问题，并对原有的《游记》版本中宗教叙述部分作了一些补足，对非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也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宽容与开放性。总体上说来，科顿版本的作者仔细、忠实地传承了原版本的中国形象并作了细微的改进。

与科顿版本不同，埃杰顿英文版本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没有做什么积极的推进。其对中国形象的主要贡献是采用一种更好的文学的形式描述中国。比起科顿版本，埃杰顿版本的翻译更为灵活，更加赏心悦目。为了清晰表达，翻译者常常毫不犹豫地调整语序，其用词亦更加简洁。书中对中国富人生活的描写更为具体，还加了一些作者的评论，鄂多立克笔下对